

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实践与未来趋势

刘 娜, 李敏伦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提出和倡导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一种新型全球价值观。它不同于世界主义和共同体主义把国家、民族和全世界对立起来，也不同于混淆社会制度差异的趋同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解决全球性的人类交往模式和世界性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历史语境，即全人类语境和公平正义语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实践的开放性。它解决了中国倡导的全世界和平共享与发展在实践上是否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构建世界美好未来提供了更广泛的建设性力量和动力学来源。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公平正义；实践开放性；建设性力量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9)02-0001-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2.00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而提出和倡导的一种新型全球价值观，是基于当今全球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促进中国对外关系和全人类共同发展而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以“合作共赢的利益观”“多种安全的新安全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内涵^[1]。当今世界国际局势和国际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更为复杂。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层面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生产规模和能力大幅提高，世界财富增加，另一方面使得利益冲突和贫富差距加剧等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因此而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反而不时陷入动荡甚至战乱的境地。欧美发达国家自身也日渐陷入发展困境，诸如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极端化和碎片化交织、政治民粹化、保守化和政党庸俗化等，进入了“一段较长的调整期”^①。从世界整体来看，除面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全球增长动力不足外，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如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传染性疾病蔓延、激素滥用、毒品泛滥等人类健康问题，网络安全、科技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扩散、恐怖主义等。面对这些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是坚持大方向和改善全球治理，还是抛弃全球化，退回各自为政的隔绝状态，“世界处于选择关口”^②。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P73)}。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倡导谋求共识、同舟共济、和平发展，为解决当今世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选择，有其深刻的历史、实践和未来发展的意义和内涵。

作者简介：刘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李敏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②} 参见傅莹：《迈入 2019，世界处于选择关口》，载《参考消息》2018 年 12 月 28 日第 11 版。

一、历史语境：全人类和公平正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雏形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后由习近平在一系列国际国内演讲和报告中补充和完善，其内涵和框架体系得以丰富起来。面对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信息化的国际形势，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世界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建立一个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也不能阻挡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应该致力于加强发展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最大的公平，也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相互交往、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产物。其独特性表现为对两个既有历史语境的继承和超越，即全人类语境和公平正义语境。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全人类语境。它注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逻辑的进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批判和超越了来自世界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大量争论和趋同论等相关意识形态的世界话语讨论。

全人类语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和演绎。在资本主义快速向世界范围内推进之前，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当资本主义受其内在利润追求的驱动，需要快速向世界扩张时，全球化即变成一个人为加速的进程，全人类语境也相应被赋予了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涵，人类共同体、世界主义、世界正义、世界公平和世界道德等范畴逐渐被引入规范性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自此，全球化和全人类语境出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立场上的话语体系分野。

马克思、恩格斯等早期共产主义理论家基于欧洲资本主义日益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和深受资本奴役和困苦的工人阶级的现状，以及人类公平自由的终极诉求，站在世界无产者的立场上，构建了包含“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人类解放”和“自由人联合体”等全人类语境，并延展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学等思想和理念。这些思想和理念一经提出，就经受了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和攻击。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冲突和碰撞中前进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别于既有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世界发展图式，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开拓精神提出并倡导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和中国方案，坚持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平等交往、立足整体、兼顾和尊重差异、合作共商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而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的全人类语境框架。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世界主义理念，后者把全球公民身份和国家、民族或某一区域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导致全球主义和国家之间的哲学、进而意识形态的分歧。如博格认为，世界主义应该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制度立法。在世界主义之下，“各自社会制度应该设计成把所有人作为平等者予以包含”^[3]，或对世界上所有人都开放的政治社会。世界正如古希腊的“城邦”，有着统一的世界法律，代表正义、公平和福祉，包括全人类。他提出的“全球资源红利”^{[4] (P52)} 方案，试图对全球范围的资源再分配，对世界上每一个人实现公平和关爱。由于这些考虑更多是基于道德层面的诉求，“有更浓重的哲学与伦理色彩”^[5]，强调个人是道德关怀的最终指向，其结果最终只能归于幻想，因而受到来自多方的批评。如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质疑其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可能性；耶尔·塔米尔^[3]和查尔斯·泰勒^[3]则批评世界主义严重漠视了民族身份和对国家

^① 参见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17/c_1123728402.htm。

忠诚的特殊情感。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世界主义的症结集中表现在其片面强调世界整体的普遍性,从而忽略了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了其片面性,“更多体现了人类的社会性、政治性需求”^[5],既强调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又尊重民族和国家的差异。习近平指出,既要“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6](P443)},又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同于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主义,如排他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后者最早可追溯到康德对世界政府的拒斥。他们强调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如米勒否认世界性的“帮助贫穷国家的一般义务”^{[7](P107)},甚至拒斥全球分配正义。不同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平等共享的全球理念,也不同于马克思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这种狭隘利益的共同体“借助国家这一政治形式,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虚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8],只注重局部和差异,看不到整体和联系,从而在民族、国家的理念下走向狭隘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总之,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分歧在于双方非此即彼、各执一端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和方法论,忽略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辩证联系,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这与既尊重民族和国家差异,又强调共同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相径庭。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迥异于趋同论及其种种变形,如完全或局部趋同论、单向或双向趋同论、均衡或非均衡趋同论等。丁伯根和贝金等认为,科技革命产生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虽既有相同点,也各有短长,但其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相近的结构成分日益增多和强化,各自的弱点将不断克服,并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以至于完全消失,最终发展为本质上同一类型的工业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阶级对抗消失,科技空前发展,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没有经济危机,没有社会不平等”^②。这种理论看似美好,实则是肯定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等级森严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引导世界向资本主义社会趋同。这与尊重差异和矛盾基础上的求同和发展、追求平等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诉求相去甚远。

人类命运共同体批判和扬弃了上述种种思想,一方面肯定世界主义的全人类角度,坚持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同时又克服了世界主义忽视国家民族存在的极端片面性,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藩篱,并自觉地与各种趋同论划清界限,主张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平等合作,共享发展,同时又相互尊重,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并保持民族国家独立性,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理论和学说。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根植于公平正义语境。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和平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即“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③。从理论渊源来说,它承袭并发展了人类有史以来关于平等的思想和对均贫富理想社会的向往、西方近代以来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卢梭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共同体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论及的人类“真正的共同体”、群众路线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等思想,

① 参见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人民日报》2013年9月5日。

② 参见百度网关于趋同论的解释, <https://baike.sogou.com/doc/5891471-6104356.htm>。

③ 参见人民网:《人民网评:让中国梦与世界梦在共同命运中交相辉映》, https://m.baidu.com/sf_baijiahao/s?id=1590887954246103004&wfr=spider&for=pc。

弘扬和拓展了世界联合国宪章关于世界人民一律平等的宗旨和原则。

与此相反，西方一些学者如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对一国之内基于无社会制度差别的普遍公共理性道德的公平正义观进行论述之后，又在《万民法》中提出“纯粹国内因素致贫论”，强调发达国家所谓的公平，忽略全球正义原则。他认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外的穷国人民应该自己负责，为自己的悲惨生活和无能的政府买单。“人民富裕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深深根植于其政治文化、支持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的宗教、哲学和道德传统之中，以及该社会成员的勤勉和合作之中。”^{[9](P150)}这种观点显然将公平正义简单理解为发展机会上的公平正义，忽略由于发展先后和程度、资源禀赋差异等导致发展能力差异，进而引起的过程不公和结果分配非正义。如因工业过度发展而导致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气候变化，因外部干预和发展不足而导致的社会动荡等问题却由全球共同承担，尤其是由弱小国家和人民承担。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0](P35)}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那些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国家不得不与那些过度保护国内市场的富裕国家进行竞争。这些保护（包括关税制度、配额制度……）是如此的虚伪和不公平，以至于它们受到了大量的批判”^{[11](P219)}。

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实践也证明了罗尔斯“正义论”的虚伪性。二战结束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高举罗尔斯式的正义理论，打着民主、人权和自由等旗帜，构建了全球贸易和竞争规则，凭借其工业化的先发优势控制了全球化的经济进程，掌握了国际话语权，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贸易条件、金融风险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欧美发达国家一方面独享本国一切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又心安理得地占有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成果（通过贸易、金融、科技等规则对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成果进行国际分配）。广大后发展国家则只能一方面依赖自身的原始资源勉力维持国家的运转和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还必须承担由先发展国家所造成的各种生态危机和社会发展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推行的所谓公平正义观，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普世价值”外交。它既主张发展机会的公平，又强调发展成果分配的正义，既坚持各国竞争规则的公平性，又强调各国合作发展的正义性和双向甚至多向性，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限，保护人种、民族、宗教和国家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下，谋求包括全世界所有人的命运共同体。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公正的世界现状。国与国之间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以取代近代以来殖民体系造成的“中心-边缘”不平衡的政治格局^[1]。

二、实践的开放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可能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必然。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昭示出其必然性和独特光芒。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曾论及世界发展的进程。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就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前进上升的发展”^{[12](P57)}。马克思主义吸收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发展的辩证思想，形成了一种实践上开放的社会历史理论。一方面强调社会意识形式的发展具有多方复杂性，另一方面承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具有不同的发展形式，展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① 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时代的主题。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预言, 人类的相互交往有利于促进世界历史性的发展, 进而将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多年里, 人类社会经历了诸多历史大事件, 诸如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对峙、资本垄断掠夺、贫穷灾难等, 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相互交往方式的反思及对现有世界秩序的反思。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福利, 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中国在新的发展征程中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智慧和方案, 倡导世界各国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这是世界时代发展的需要, 也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同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中国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可行性路径的阶段性结果。它不是如巴迪欧、阿尔都塞等人所认为的突发的革命性“事件”, 或虚拟化的“共产主义观念”的盲目信仰冲动, 一种“共产主义视域”^[13], 一种未来社会的替代或可能, 而是一种正在实践和实现的现实, 是人类通向理想未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实践。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全球化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阶段人类社会推动世界发展成本最小(其引起国家内外暴力动荡的可能性最小), 世界公约数最大(其得到其他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其内部不同阶层的广泛认同和呼应的可能性最大), 最为便捷和最合适的阶梯和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僵化的决定论或一成不变的教条, 而是一种辩证的逻辑建构。它主张和坚持参与实践主体的多元性、非针对性、非排他性、平等性和自立性以及主体发展环境的和平性, 从而体现了实践上的多元开放性。

首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中国有实力、制度、文化和信心推动构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推动者。中国经过 70 年独具特色的发展, 至 2018 年底,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90 万亿元, 占世界经济比重 15% 左右,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2018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 30 万亿元, 实际使用外资 1 383 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①, 且依然保持着中高速的发展势头。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国家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物质支撑。中国实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决定了其一切政策的制定和实践都不会偏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以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互帮互助、平等正义、辩证发展为内核, 更易于增强其他国家尤其弱小国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兴趣。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 中国一方面致力于“打铁必须自身硬”, 从严治党, 埋头苦干, 夯实和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前进道路, 另一方面也不断向世界证明自身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决心, 以促使自身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伟大的时代创举。近年来, 中国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这一新思想新理念新主张落地生根, 以“中国倡议”丰富外交话语体系、以“中国智慧”引领新型首脑外交、以“中国方案”发挥表率实干作用^[14], 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其次,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价值观符合民族国家和全世界的整体利益, 因而最终必然会受到大部分国家的赞赏和支持。当下的国际现实是, 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 对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和中国新的世界角色充满“警惕和猜忌”^[15], 不惜以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的手段来打压、控制世界新的增长力量, 以维持旧有的世

① 参见李克强 2018 年和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

② 自毛泽东以来,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明确表明中国要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2017 年 10 月, 习近平在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再次宣告: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界秩序和既得利益,并推动世界保护主义抬头,制造全球化式微的舆论,蛮横炮制导致世界失序的全球性事件如伊核问题、南海仲裁案、土耳其军事政变、中美贸易摩擦等,引起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动荡、不安和冲突。世界格局的动荡变化、世界权力平衡的打破,突出地反映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之间价值观和历史观博弈的日益深化。“只有通过共同命运才能够区别于近代世界史中争夺资源、财富、市场和权力的扩张之路,改变以财富分配和权力制衡为基调的现代国际关系。”^[16]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根本动力是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合作共赢”^[17],世界各国应以全人类命运为己任,尊重世界文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抛弃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遵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落实和建构。这些倡议和构想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欢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断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伟大计划,我非常希望能够实现。中国为这个目标所做的努力令人敬佩”^①。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有一系列国际机制和世界舆论的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是空中楼阁、完全另起炉灶,而是在不否定现有国际机制、保障世界人民利益的背景下,探索新的更有效的国际实践机制。一方面继续依托于二战后陆续建立起来的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既有全球化和全人类机制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主要构建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而构建的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的世界利益共建共享模式。前者通过推动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可行的实践基点,赋予了世界主义理念以当代的现实意义,为整合全世界的力量、重构全球治理机制、开拓国际新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提供了一个深厚而宽广的世界历史框架,后者则“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8](P59)},开启一条全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等和共赢的世界新格局,为形成新型经济伙伴关系、积极打造全球政治互信、经济互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提供了现实路径和平台。例如,“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中国已经同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对协议相关国家投资已超过500亿美元,落实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制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②。亚投行成立3年,其成员数就由成立之初的57个增至93个,累计批准项目投资75亿多美元,涉及13个国家,覆盖交通、能源、电信、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③。阿·汤因比曾指出:“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19](P282)}

三、未来趋势: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

作为立足当今中国、符合世界潮流、构建世界未来的美好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组成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形成覆盖全球的“朋友圈”,各国人民结伴而行,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在实践方面,相对于既有的资本全球化的全人类语境和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出了超越旧有世界秩序的建设性;在理论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人类的美好未来提供了更广泛的、世界性的实践主体和动力学来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获得了新的意义和牵引力。

基于150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发展现实,马克思从社会分化的维度,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①②} 参见人民网:《人民网评:让中国梦与世界梦在共同命运中交相辉映》, https://m.baidu.com/sf_baijiahao/s?id=1590887954246103004&.wfr=spider&.for=pc。

^③ 参见赵觉理:《成立三年,亚投行交出怎样成绩单》,载《环球时报》2019年1月12日第5版。

将当时重大的社会构成区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并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实现理想社会的重担交由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将其作为世界进步的主要动力和力量。经过百年演化，传统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所起的社会变革作用，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业无产阶级在发达国家大量减少、分散和转移，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和分散化的特点。“我们不仅能在工厂和矿井中找到他们，而且也能在办公室、商店、医院和养老院发现他们。”^[13]这一群体没有如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那样规模庞大、统一行动、集中而有组织。“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分化。”^{[20](P240)}昔日团结紧密的工人阶级，如今似乎已经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力量。他们会突然由于某种偶发事件而奋起抗争，也会因某一事件和原因而选择妥协而消失。“马克思所设想的会带来共产主义的革命性力量尚未出现”^[13]。因此，西方有些学者提出，工人阶级消亡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最后“终结者”。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证明上述“终结论”观点不成立。它唤起人们对世界进步力量存在的重新关注和对构建人类美好未来的现实期盼。很显然，世界的美好未来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人民的同情、资本家对工人的大发慈悲和道德友善的良心发现，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里叶所空想的那样，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委曲求全，更不能掩耳盗铃、视而不见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别矛盾而假装世界同一，或寄希望于突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恰恰相反，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义务和责任积极探索世界和平发展的新途径。而推动理想未来的理念、现实路径及机制，其主导力量只能是工人阶级（尽管其“内部的构成以及劳动方式等都有了很大变化”）、领导和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由工人阶级的政党执政的国家^{[21](P90)}。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既包括共同体中作为群体存在的主权国家、特殊地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也包括社会生活中作为个体存在的‘现实的人’”^[22]。其作为一种推动当今世界体系发生进步变革的、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具有构建世界美好未来的指向性。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一个世界各国人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顺应世界时代发展和世界人民的愿望，短期内取得了广泛的国际回应和实践成就。这一事实表明，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并没有消失，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目标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新的替代力量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它呼吁和倡导世界各国从人类长远利益出发，认同和践行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发展观，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思维，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达成相互依存、同舟共济、求同存异的共识，以共建共享、合作参与的世界命运共同体，共同解决经济安全、气候变化、互联网安全、核安全和恐怖势力等世界难题。这一倡议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崇尚，而且是全世界追求世界和平、平等、共享发展和幸福生活的人民的最大福祉，也是应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问题和探讨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设性方案。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传播和实体构建，必将促使分散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落、各个层级的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聚合，从而使构建美好世界未来的建设性力量具有了世界意义。无产阶级作为推动公平正义、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23](P280)}，“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23](P281)}今天，这一力量不仅包括当今社会日益分散

^①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5版。

化、碎片化的工人阶级,而且还包括被剥削和压榨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同时,也集结了所有可能的和潜在的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进步人士。“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23](P281)}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联合只以天计、时计。2011年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近年来在世界各大洲社会轮番上演的各种街头运动,乃至2018年法国爆发旷日持久的“黄背心”示威运动,其参与者遍布社会各阶层,并得到各地不同形式的呼应。这些街头运动的具体诉求虽然不尽相同,但其价值追求显示了当今世界追求进步变革力量的多元性和多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①。它不仅在世界播撒全球和平共享发展的火种,而且必然对全世界范围内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进步力量的聚集发挥重要的作用。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处于分裂和垄断世界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希望和集结地。当今时代,资本的全球化一方面加速了全球的分裂,另一方面加剧了资本的全球垄断和扩张,进而把战争、动荡、奴役、剥削、压制、全球性危机等威胁、痛苦乃至蹂躏扩展到了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呼唤一个安宁、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的世界人民提供了希望。共同管理、相互尊重、共享发展成为一切期盼改变不合理现状和推动世界发展的进步力量的集结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0](P691)}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共享为理念,推动世界朝着和平、进步、开放、发展、共享的方向前进,并通过中国自身稳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为世界发展提供新动力^②,为人类美好社会的实现提供深厚的世界人民的群众基础。正如雅克·布道曾指出的,创造一个可行的世界共同体,必然是一种崭新式的、服务于平等需要和平等志向的“追求普遍利益的社会力量”^{[23](P492)}。这一新的社会建设性力量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即致力于创建走向美好未来的、切实可行的世界共同体。

四、结 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建立起来的既有的世界秩序,它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强权地位和利益。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和斗争,在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会不断涌现,有时候会表现得相当激烈。另一方面,世界要求公平正义的进步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上不发达国家要挣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加诸自身的压制和欺凌,需要在思想觉悟和实力上强大起来,才能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为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和平共享、和谐发展的世界秩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4](P567-568)},“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25](P104)}。

然而,世界走向美好未来的愿望不会因其漫长而停止前进的脚步。“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③。何况,人类正在从理性文明向德性文明转型,“天下”人正面临着一次全体性的“自我超越”^[2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全球化深化和全球治理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背景下关于世界、主权、国家和正义等问题争议的一次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突破。它既保留了

^{①②③} 参见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奋力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中国政府网 2017-12-01。

世界的开放性, 又尊重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在理论上, 它突破了以国家主义、情境主义为基础的共同体主义和以全球主义和普遍主义为理念的世界主义两者之间相互对立的鸿沟, 抛弃了混淆差异性的趋同论。在实践上, 它以开放包容的“一带一路”、共享发展的中国方案, 打破了由资本主宰的强权和不公正的世界秩序, 并为全人类提供了一条通往自由平等“真正的共同体”的、世界人民都拥戴的、建设性的发展道路。这一新型理念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全世界的。它是中国人民在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进道路中摸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方案, 在解决全球性的人类交往行为模式和世界人民的公平正义难题等方面为世界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①。我们坚信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为人类走向美好未来开辟一条通途。

参考文献

- [1] 张雷声.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12).
- [2] 习近平.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3] 高景柱. 当代世界主义: 批判与辩护[J]. 国外理论动态, 2017(9).
- [4] [美]托马斯·博格. 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M]. 刘莘,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 [5] 蔡拓. 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比较分析[J]. 国际政治研究, 2018(6).
-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7] [美]戴维·米勒. 论民族性[M]. 刘曙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8] 陈鑫.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视阈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J]. 理论月刊, 2017(10).
- [9] [美]约翰·罗尔斯. 万民法[M]. 陈肖生,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10.
- [10]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Thomas, W. P. Do Rawls's two theories of justice fit together? [A]. Rex Martin and David A. Reudy (ed.). *Rawls's Law of Peoples: A Realistic Utopia?* [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 [12] [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6.
- [13] [英]塞耶斯. 关于共产主义的观念[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7(5).
- [14] 郭锐, 王彩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7(5).
- [15] 刘同舫. 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落到实处[J]. 红旗文稿, 2018(21).
- [16] 史宏波.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蕴与历史意义[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8(6).
- [17] 李秀敏. “真正的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之辨[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11).
- [1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9] [日]池田大作, [英]阿·汤因比. 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荀春生, 等,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
- [20] 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21]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2] 郝立新, 周康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7(6).
- [23] [美]雅克·布道. 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M]. 万俊人, 等,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24]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5]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26] 杨新泽. 中西“文明”本义辨证——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德性文明的兴起[J]. 长白学刊, 2018(1).

^① 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6年9月29日第2版。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istory, Practice and Future

LIU Li, LI Min-lun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new type of global value proposed and advocated by Xijip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Different from cosmopolitanism and various forms of community, the country, the nation and the whole world are absolutely oppose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a unique historical context in solving global human communication models and world problems. One is the context of all mankind. The other is the contex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the openness of practice. It solves the problems of whether and how the world's peaceful sharing and development advocated by China could be realized. Finally,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ot only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theory in practice, but also provides a broader constructive power and dynamic source to get rid of the injustice and hardship of the existing world and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ll mankind; fairness and justice; practice openness; constructive power

(责任编辑 孙 洁)